

本地特稿

清初湘东地区的客家移民潮

白沙

沿湘赣边境蜿蜒的罗霄山脉北上,依次有桂东、炎陵、茶陵、攸县、醴陵等县,这一广袤的区域到处是崇山峻岭。明末,“棚民”活动其间,至清代初年,人数逐渐增加。他们以种植苎麻、蓝靛、药材为业。清朝宰相张廷玉在他的《清定安辑棚民之法疏》中说:“有曰棚民者……其间失业之徒,沿缘依附,什百成群,刈苎沤麻,倚为生计。”

张廷玉所称的“棚民”,其实就是客家人,客家文化研究学者通常将客家人的大规模迁徙分为5次,而大规模迁徙到湘东地区当属第4次,即“西进运动”。其时,客家人因人口繁衍,生产资料贫乏,遂向川、桂、湘、台等地迁徙。

据《酃县志》(1994年版)记载,客家人迁徙到该县始于宋、元时期,明末、清初趋多,于康熙、乾隆之际形成高潮,一直延续到清末。他们大多数从广东的梅县、兴宁、五华、乳源,或从福建的汀州、上杭、连城、武平等地迁入。

在醴陵,间接有客家人迁居的记述。《醴陵市志》(1995年版)的“大事记”载:“康熙十三年(1647),降清明将吴三桂反清,分兵住醴陵,建木城。由闽粤经江西来醴陵种麻棚民组织反清复明的麻棚军,配合吴三桂作战。”《攸县志》(同治版)记载:

“迨来闽粤之民,侨居吴楚,自吉袁至楚南各邑县所在皆是。以为主户,而非土著,以为客户,则已无他涉。而其人又居山而不居泽,凿岗伐岭。”

这些记述清楚表明,当时的客家人涌入湘东地区已是普遍现象了。那为什么清朝的初期,在湘东地区掀起一股客家的移民潮呢?

首先是湘东地区具有独特的山地,适合客家人的耕种习惯。所谓“逢山必住客,无客不住山”,客家人系本是在闽粤地区当第4次,即“西进运动”。其时,客家人因人口繁衍,生产资料贫乏,遂向川、桂、湘、台等地迁徙。

其次是湘东地区长期的战乱,使得人口凋敝,为客家人迁入提供了空间。《酃县志》(同治版)记载:“(顺治)六年贼(指金声桓)踞王镇,屠戮过半。八年复被粤寇十三营烹杀几尽……十一年大师被剿,知县傅继说召集灾鸿,历年仅得老幼1200人,逐无留余,以待缺额”;“粤寇十三营万余号军中,贼陷城,知县徐鼎臣、于琨先后死之”。以万余兵力战一个山区小县,知县死之,平民死之,可见惨烈的程度。邻近的桂东县、桂阳县情况大体与酃县类似,《桂东县志》(同治版)有描述:“顺治五年,江西南昌金声桓、王德仁叛变,自永宁入据酃县(今炎陵县,下同)……余贼遁入桂阳、

桂东,大肆杀掠。又有广东流贼王宗等聚众五千余人,裹红巾为号,入据桂阳县……饥贼杀人以食,屠割最惨,死亡过半。”茶陵县亦遭受“红巾”铁蹄的践踏,只不过损失程度不及酃县、桂东而已。

醴陵“自崇禎十六年至顺治十一年,人民备受兵力、饥荒、厉疫诸劫,死亡过半,业荒无主”。康熙十三年(1674年)发生的“三藩之乱”,对浏阳、醴陵影响甚为严重。战乱造成满目疮痍,人丁凋零,田地荒芜。此时,“招民垦荒,以充国赋”自然是县衙的重中之重。这样的环境,为客家人的迁入提供了有利的条件。

平江县独善其身,明末清初的战火没有烧到这片土地上。然而县境的东南有一大片没有利用的山地,于是,康熙四十二年(1703年),“伍士琪招广东、福建民于东南山区开垦,立名户福兴,编在第二十里,雍正七年入籍”。像平江县这样有计划招募、成建制屯垦、整体解决户籍,是湘东地区客家移民的一个特例。

第三个原因是“摊丁入亩”和“和平安置”一系列政策的实施,为客家人的迁入扫清了障碍。对于客家移民来说,意味着取得当地的户口变为可能。这项制度各地实施时间尽管稍有差异,但基本在雍正年间执行完毕。

大量的闽粤籍客家人移入湘东地区,带来了另一种生产和生活方式,客家人沿袭原住地的生产习惯,带来苎麻、蓝靛、番薯、玉米、油茶、药材等作物种子,推动了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发展。如红薯(番薯)的种植,“番薯出西洋,闽粤人以此耕山者……色黄味甘,食之疗饥,可以备荒。”红薯的推广,让千千万万的饥民得到实惠。油茶的引进与推广同样具有重大意义,在《攸县志》(同治版)记载中,志书将油茶归类于物产中的花属,排在山花之后,一方面说明当时的史官们还没认识它的用途,另一方面也说明,在客家人迁徙到这里以前,土著居民并没有种植油茶的传统。

在大力发展农业的同时,客家人的迁徙也促进了工业的起步。比如“雍正七年(1729),广东兴宁移民廖仲威在沩山(醴陵)发现瓷泥,祖山开矿,招工传艺,创设瓷厂”。这仅是一个典型的例证。

客家人颠沛流离,饱经风霜,客家人迁徙过程充满血泪和辛酸。一个移民潮对于一个区域来说,所带来的是一次冲击。移民与土著的融合,又会带来理念的更新以及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改变,评价清初湘东地区的客家移民潮,其意义无疑是积极的。

原载“湘东文化”网站

史话

古代人如何爱美

女子妆之美也。自古女为悦己者容。“一日新妆抛旧样,六宫争画黑眉眉。”由此可见古时人们就对于化妆有了一定的涉及。

朱砂我国最早的装饰颜料之一,其色润红,是女子妆红的用品。“朱唇皓齿,姆以姆只。”殷周时期已用燕地红兰花叶捣碎取汁凝做脂(胭脂)来饰面。

唐代人们对于美的要求更甚,武则天命令御医炼制益母草敷面,可使皮肤滋润,细嫩。可谓“手如柔荑,肤如凝脂。”宫廷中使用的面膜是由名贵的中草药提炼而成。此类面膜不仅可以使皮肤光泽,白嫩富有弹性,还可以深层次清洁死去的细胞和毛孔深处的污垢。

唐代诗人张佑《弹箏》诗有云:“十指纤纤玉笋红,雁行斜过翠云中。”可见在

古代上流社会人们为了获得君主的注意用薝丹(金凤花)染指。

元代《御药院方》中就有宫廷美容三方。此方是由猪实散,桃仁膏,以及屑屑膏三部分单方组成。第一单方用于洁面,第二单方用于敷面,第三单方用于敷面后涂于面部。与当今的洗面奶,护肤面膜,自己护肤品的联合使用方法如出一辙。因此称为美容三方。

古时达官显贵家妇人的眉毛大都由螺子黛,青黛,远山黛化就。“色酣眉黛绿,香赋口脂红。”清代宫廷御方中有慈禧太后用于治疗面部粗糙,黑斑以及美白功效的玉容散。玉容散中加入了白丁香,白芷,白附子,白僵蚕,防风,羌活等19味中草药研磨成粉,再加一两绿豆粉均匀混合而成。



文史博览

古人为何“坐读经史、卧读小说”?

朱林

说到古人读书发奋用功,欧阳修的“三上”——马上、枕上、厕上——大概属于流传最广的故事。即使在今天,在枕上、厕上读书想必也是很多人的习惯。但在马上读书的说法,却有待商榷。以现代社会的体验,即使在颠簸不算明显的汽车上看书,相当一部分人也会因晃动而晕车,更何况在马背上看书。

事实上,这个故事在流传过程中逐渐产生讹误,欧阳修在《归田录》中这样写道:“余平生所作文章,多在‘三上’,乃马上、枕上、厕上也。盖惟此尤可以属思尔。”换言之,欧阳修是在“三上”作文,而非读书,并且他给出自己的理由:可以更好地

构思。

虽然欧阳修并没有说自己在“三上”读书,但在同一则笔记中,他却道出同时代文学家钱惟演的类似癖好——“(钱惟演)在西洛时尝语僚属,言:平生惟好读书,坐则读经史,卧则读小说,上厕则阅小辞。”

那么,钱氏为何“坐读经史、卧读小说”呢?

首先,上文“小说”并非现代汉语中的小说,此处“小说”相当于杂记、笔记,而“小辞”则可以理解为诗文书画。进一步讲,“小说”语义近似“子部”,“小辞”语义近似“集部”。因此,钱惟演的话可以转换为:坐读经史,卧读子,厕读集。

这就又涉及古代图书的分类。自《隋书·经籍志》确立四部(经、史、子、集)分类法,后世大型典籍也多用四部将图书分类,典型代表即《四库全书》。

经部收录的儒家“十三经”及其注疏等相关著作。自汉武帝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,儒家思想成为官方意识形态,儒家经典的重要性对于古代士人不言而喻,“经”自然是重中之重。

史部收录各种史书。古代经史不分家,合称帝王之学。司马光撰《资治通鉴》,书名即来自宋神宗御笔——“鉴于往事,有资于治道”。龚自珍“灭人之国,必先去其史”也表明,在古人眼中,“史”

与“政”是密切相关的。史部于古人的重要性可见一斑。

子部收录诸子百家著作,包括阴阳五行、书画草木、杂记小说等五花八门的著作;集部则是收录诗文书画的总集和专集,多为文学作品。但在古人眼中,经史之外,皆求流杂学。所谓“学者研理于经,可以正天下之是非;任事于史,可以明古今之成败;余皆杂学也。”

厘清了四部图书分类,钱惟演在读不同门类的书时所采取的不同姿势也就容易理解了:经史乃帝王之学,必须“正襟危坐”,子集乃末流杂学,可以卧读,亦可厕读,无关紧要。

落实安全责任 推动安全发展

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



设计/黄洞庭

株洲日报宣